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4-05

[作者] 程曼丽

[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新闻事业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的系统看法和理论概括。一个世纪以来，她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对现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在继往开来的新形势下，对党的新闻思想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及其规律、特征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新闻事业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的系统看法和理论概括。一个世纪以来，她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对现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在继往开来的新形势下，对党的新闻思想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及其规律、特征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必须抓住一条纵线和三大主题，即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延续性和革命、改革、发展三大主题。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奠基者。由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决定，其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思想与论述，主要是围绕“革命”二字展开的。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包括报刊宣传活动）起始于“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着统治阶级的重压与反抗，因而被统治者无不“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以“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1]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如此，美国独立战争亦然。不同的是，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了更为突出的“革命性”，因为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全面取代私有制，其难度显然更大一些。况且，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90%的国家中进行的，而农民中的大多数“没有政治的兴趣”，只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因此，革命思想的导入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人民的觉悟是不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2]他甚至这样强调报刊宣传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3]由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身兼二职——既指挥打仗，又领导办报，“这就使他总是从政治斗争需要的角度，规定革命报刊宣传的任务和作用”，也是他“始终特别重视报刊宣传工作……的原因所在”。[4]正如列宁所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纵观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的报刊思想与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把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战斗武器、把新闻事业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因而其新闻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突出报纸“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毛泽东从投身革命运动之日起，就把报刊作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报刊宣传实践中，他不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阐述报刊的作用，还明确提出了利用报刊反击敌人的具体办法。例如他在为《政治周报》撰写的“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办报的方向和报刊的政治任务。接着，他又针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指出“‘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这又具体申明了革命报刊不是无聊文人的“混饭把戏”（当时存在的一种糊涂认识），而是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二、强调报纸的宣传、鼓动、组织的作用毛泽东不但主张利用报刊揭露敌人、打击敌人，而且注重利用报刊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例如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他还指出：“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

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显然是受到列宁办报思想的启示。[5]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时，在“致读者”一文中表示：要使报纸真正像列宁教导的那样，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该报还对“集体”一词做了明确的表述，指出“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仁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党经过报纸来宣传、经过报纸来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在《解放日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里，报纸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络就能与党的脉络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6]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报作用（宣传、鼓动、组织作用）的论述，正是列宁关于党的机关报办报思想的具体体现。三、强调报纸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职能在毛泽东关于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党的新闻工作必须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他一方面要求党的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同时又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把报纸看作是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发表）中，对党报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各机关”“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并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早在红军创建时期，他就把报纸宣传作为“第一个重大工作”，利用它来揭露敌人，聚合民众，为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服务。在长征路上，甚至在敌人围、追、堵、截的过程中，红军报纸始终坚持出版，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要求报纸成为“抗战的生力军”，“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7]解放战争中，他更是调动一切宣传手段，甚至亲自动笔写消息，为革命战争的胜利鼓与呼。可见，毛泽东的这一办报观念，体现了他对报刊与革命运动的关系的考察和对报刊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的深刻理解。四、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报最突出的特征（列宁也曾明确指出，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凡是党所领导的报纸，都要成为“完全的党报”，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坚持党的立场，执行党的路线，宣传党的政策。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在《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1948年8月28日）一文中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为了保证党报具有党的性质，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的口号，明确指出：“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他不但要求报纸从性质上成为“完全的党报”，而且将新闻的选择、版面的编排等都提到党性的高度去对待。例如他曾批评延安《解放日报》不该刊登党校学生自杀的消息，说报纸应和中央息息相关，自由主义在报社内不能存在。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把日常的新闻编排业务看作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把它和党的目标、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总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心点上，并围绕这个中心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提出报纸宣传的任务和它应当发挥的作用。“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8]在他的新闻思想主导下，党的报刊宣传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它使深受封建思想浸淫的、愚昧、落后的乡村民众逐渐觉醒，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它使广大的城市青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投奔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一时的潮流；它还使“中国的西北角”成为世界屏幕上的一个亮点，引起了更大范围内的关注、同情和支持。而最终，“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逐渐形成的关于新闻事业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的思想被确定下来，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成为新时期报纸宣传工作的指导性的理论和原则。这些理论和原则包括：办报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阶级消灭之前，不论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新闻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的论述，等等。“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论点和基本内容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不仅适用于夺取政权时期，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9]当然，“新中国的新闻工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失误和不足”。这与毛泽东某些新闻观点“提出的时机和内容方面的缺陷”以及对它的“理解和执行方面的问题”[10]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情况下，就有潜在的消极作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更是利用这一论点做文章，把阶级斗争工具作为报纸的性质，当成报纸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职能，对我国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都造成了重大的危害。但是，瑕不掩瑜，在奠定党和国家的新闻理论基础方面，毛泽东功不可没。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同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新闻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更新，从而丰富和发展

党的新闻思想和理论。由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其关于党的新闻事业的论述，是紧紧围绕“改革”二字展开的。纵观邓小平的理论、实践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贯穿在他对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中的，具有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视角。他的新闻思想具有以下特征：一、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继承性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1]这集中反映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与毛泽东相同，邓小平把新闻事业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和建设目标、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手段。他强调“党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强调“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强调“报纸、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增强党性”。这些充分表明，邓小平的新闻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二、突出报纸稳定大局的作用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以邓小平为中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为新时期新闻工作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鉴于上述错误方针在“文革”中造成的严重后果，邓小平把“稳定”二字提到“压倒一切”的高度，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这是他对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对新时期的重大理论贡献。他认为，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好坏，对能否实现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安下心来搞建设，关系极大。因此他要求“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并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把握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报道中正确地体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总之，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稳定”的思想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三、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报刊批评问题，早在建国初期，就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拥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报纸的批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针对“文革”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1月29日），再次重申：“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邓小平不搞运动、坚持批评的主张，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新时期的新闻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邓小平新闻思想特征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人，邓小平全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他的新闻思想体现了改革的精神，也是改革时代的产物。正是在他的新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新闻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三、以江泽民为中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新闻思想具有以下特征：一、历史继承性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9月）的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的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他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2]与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相同，江泽民把新闻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具体到宣传工作的任务，他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在全党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都要通过宣传思想工作灌输到群众中去。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担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责任。我们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需要宣传工作提供有力的保证。只有全党全国人民目标明确、思想统一、精神振奋、行动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前进。”[13]鉴于北京政治风波中一些媒体的表现，江泽民特别强调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指导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的工作，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和舆论阵地，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14]由此可见，江泽民是一代继往开来的领导人，他关于新闻宣传的思想，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共同特征。二、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闻导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社会生活各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多种价值观念引起了多种舆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舆论氛围。为了“加强正面教育、正面引导，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江泽民在1994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项工程”，其中，“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已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同一篇讲话中，江泽民对这一任务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指出，正面教育、正面引导，就是要弘扬主旋律，而“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

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在江泽民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中，涉及最多的就是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问题，由此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导向说”。“导向说”揭示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按照江泽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要求，新闻媒体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包括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恰当的处理，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同时注意抓典型、树标兵，持续进行宣传教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强调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而在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扑面而来和国际局势日渐复杂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就更突出了。因此，搞好对外传播，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始终是江泽民关注的一个重点。1993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搞好对外宣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对外宣传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比较弱小，我们的宣传手段还比较落后。宣传的办法也不多，直接影响着对外宣传的效果，这种情况应当努力加以改变。为完成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从事外宣工作的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改进和切实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外宣工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5]他在1999年2月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任何国家要加快发展，不开放不行，不同世界各国交往不行。要开放，要交往，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16]江泽民不但及时指导外宣工作，而且通过接见外国媒体领导人、在西方主要媒体发表文章等渠道，主动介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原则立场。这对加深国外媒体以及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强调对新媒体的利用 20世纪末期，在传统媒体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种新兴媒体——国际互联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具有强烈的科技意识和前瞻意识的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导人，江泽民对此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就如何利用新媒体搞好舆论宣传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他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信息传播业正面临着—场深刻的革命，以数字压缩技术和卫星通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使信息传播的范围、传播的速度与效果都有显著的扩大和提高。现在，一个消息通过互联网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说明信息技术还在快速向前发展。‘数字地球’也好，知识经济也好，在不同国家必然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到下个世纪，各国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世界各国争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力争在21世纪的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为扩大对外宣传服务。”他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关注和研究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抓紧学习网络知识，善于利于网络开展工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就在这次会议前后，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记者独家采访，在接见杨振宁等6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时多次谈到互联网的建设和管理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谈论互联网问题，充分说明江泽民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17]通过对江泽民新闻思想的分析可见，他的新闻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了发展的要求，也必将在发展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以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党的新闻工作的日渐成熟和理论的逐步完善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此形成了革命、改革、发展三大主题。这三个阶段、三大主题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发展中有继续，继续中有发展，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这部大书的主要篇章。在党的80年代历程中，尽管客观条件不同，时代要求不同，传播手段不同——从毛泽东时代伊始的传单、小册子，到邓小平时代完整的媒介体系，再到江泽民时代新兴媒体互联网的登台，但三代领导集体利用新闻媒体的内在动因却是共同的，即利用媒体广为传播的功能，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而党领导的新闻媒体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它的参与和直接作用下，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阶段，胜利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又在改革和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诚然，在某些历史阶段上，党的新闻媒体也出现过问题，犯过错误，其理论体系中仍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这些是可以通过总结历史教训予以避免或改进的。长期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主要论点和基本内容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科学性和合理内核不容置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注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1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31页。 [3]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61页。 [4]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67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65、566页。 [6]《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 [7]《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585页。 [8] 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68页。 [9] 林枫著：《新闻改革理论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4页。 [10] 林枫著：《新闻改革理论探索》，8页。 [11] 《邓小平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94页。 [12] 《邓小平论新闻宣传》，1页。 [1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665页。 [1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626~627页。 [15] 1993年《中国新闻年鉴》，3页。 [16] 《人民日报》1999年2月27日。 [17] 引自陈富清博士论文：《江泽民新闻思想研究》，238页。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